

讀通鑑論

第一冊



王夫之著

讀通鑑論

第一冊

中華書局

新

通

鑑

論

讀通鑑論

(全十册)

〔清〕王夫之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五二三廠印裝

787×1092毫米 1/16·166²/₇。印張·544千字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18·667 大字本定價：15.50元

前 言

《讀通鑑論》是明末清初進步思想家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晚年所寫的历史評論。王夫之字而农，号薑齋，湖南衡阳人。他从年輕的時候开始，就很关心当时的政治形势，注意研究历史。他的儿子王啟写的《薑齋公行述》說他「自少喜从人間問四方事，至于江山險要，土馬食貨，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中年時曾參加抗清斗争，后来隱居于衡陽城外石船山下，所以又称船山。他的著作有一百多种，

包括政治、哲學、歷史、文學等各个方面。

明清之際，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一個大動蕩的時代。明朝中葉以後，封建統治極端腐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由於皇室強占和豪強兼併，土地集中的情況非常嚴重。以蘇州、松江地區為例，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沒有土地。豪強地主對失去土地的廣大佃農，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地租一般要占到土地收穫物的百分之六、七十。他們不僅在經濟上殘酷剝削農民，而且在政治上殘酷壓迫農民。廣大貧苦農民被逼得無法生活，以至死走逃亡。明末的捐稅賦

役又十分苛重，使得自耕农甚至一部分中小地主也陷于瀕临破产的境地。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明朝后期，农民起义前赴后继，此伏彼起，连续不断。最后终于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农民起义的偉大风暴，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而且也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

在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激烈的同時，民族矛盾也激化起來了。居住在我國東北地區的滿族，很久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明代在女真族（滿族的前身）聚居地區設置的建州等衛，都是隸屬於明朝中央政府管轄的行政區。努爾哈齊統一了女真諸部，建立了「後金」政權。皇太極繼位，改「後金」為「清」。滿族貴族軍事政權不斷向明王朝發動掠奪性的戰爭，這不但使明朝統治受到嚴重的威脅，同時也給漢滿兩族勞動人民帶來了災難。一六四四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舉攻克北京，推翻

了明王朝的反动統治。被推翻了的明朝大地主階級不甘心失去他們的「天堂」，竟公开勾結滿族貴族，向农民起義軍进行猖狂反扑。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義，在汉族大地主階級和滿族貴族的联合鎮压下失敗了。取代明王朝統治的，是滿族貴族与汉族地主階級專政的清朝封建統治。

在激烈的階級斗争的制約和推动之下，地主階級内部儒法两条路綫的斗争，必然要反映时代的特點。王夫之就生活和战斗在这样一个階級斗争和民族斗争十分尖銳劇烈的时代，他站在地主階級革新

派的立場上，反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主張改革，反對分裂割據和民族壓迫，主張國家的統一。他以朴素的唯物主義，批判宋明唯心主義的反動道學，以發展進化的歷史觀，反對儒家的復古倒退的歷史觀。

在《讀通鑑論》里，作者通過總結歷史經驗，結合明末現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這部書比較集中地反映了王夫之的進步歷史觀和尊法反儒的思想傾向，是我們研究明清之際儒法鬥爭和王夫之政治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前进的，还是停滞不变，倒退的；历史上的「兴衰治乱」，是有其必然趋势和一定规律的，还是由「上天」的意志决定的；这是儒法两家两种对立的历史观，也是儒法斗争反映在历史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孔丘、孟軻到董仲舒、韓愈、朱熹、王守仁等儒家代表人物，总是伪造历史，宣揚厚古薄今和今不如昔，为他們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制造「理論」根据。他們喋喋不休地把所謂「三代」以前的社会描繪成理想的「盛世」，认为后世的人类社会是一代不如一

代，胡說什麼三代以上「天理流行」，三代以下「人欲橫流」。王夫之認為這種越古越好的謬論，完全是無稽之談。他根據歷史事實駁斥了這種騙人的鬼話。他說：「唐虞以前，無得而詳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昏姻未別，喪祭未修，狃狃獠獠，人之異于禽兽無几也。」（《讀通鑑論》卷二十，以下凡引本書者，只注卷數。）他指出，上古時代的人類還處於未開化的原始狀態，「飢則嗷嗷，飽則棄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思問錄·外篇》）。這是王夫之在人類起源問題上，以朴素的唯物主義的觀點，向儒家唯心主義的勇敢

挑战。对孔老二的「信而好古」和历代儒家言必称三代，口不离三王的虚伪说教，王夫之也痛加驳斥。所谓「三代」，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王夫之指出，那时候生产水平和社会制度都很落后，人民生活非常痛苦。「国小而君多」，「暴君横取」，人民「鹄面鳩形，衣百结而食草木」（卷二十一），根本不是什么令人向往的「盛世」。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世益降，物益备」（卷十九），历史愈向前发展，物质生产就愈丰富。这和儒家宣扬的今不如昔的反动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王夫之還針對儒家「法先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的反動叫囂，提出了「事隨勢遷而法必變」和「趨時更新」的政治主張，認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他說「洪荒无揖讓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漢唐无今日之道，則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傳》卷五）。「漢以後之天下」，只能「以漢以後之法治之」。在王夫之看來，歷史在發展，時代在前進，根本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制度和法令，一切制度和法令，總是隨着時代的不同而變化。所以他認為「就今日而必法堯舜也，即有媿媿長言為委曲因時之論者，不可听也」（卷

二十四)。这和先秦杰出法家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论点是一脉相承的。

历代儒家都把历史歪曲捏造成为由「天」的意志决定的。胡說「天」是人类命运的主宰，天下的兴亡治乱，人們的貴賤禍福，都是受「天」支配和由「天」来安排的。他們用反动的「天命論」，用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唯心論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来欺騙劳动人民，为反动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务。王夫之則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趋势

和一定規律的，他繼承和發展了唐代杰出法家思想家柳宗元關於「勢」的概念，並把它和「理」聯繫起來。王夫之說的「勢」是指歷史發展的趨勢，「理」是指歷史發展趨勢中的規律性。他說：「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宋論》卷七）。又說：「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又只在勢之必然處見理」（《讀四書大全說》卷九）。他認為國家的治亂存亡和人的生死壽夭一樣，都有其自身的必然規律，「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

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
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
自昧之……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卷
二十四）。既然歷史的發展，國家的治亂存亡是有規
律的，那就可以由人來認識和掌握。這就需要發揮人
的主觀能動作用，「故大智者，以理為勢，以勢從理」
（《春秋家說》卷一）。這是同儒家宣揚的反動的天
命論完全對立的。

當然，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王夫之還不可能
科學地闡明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更不可能認識歷

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他所提出的「勢」和「理」的概念，仍然還只能在封建王朝的興衰治亂中打圈子，沒有也不可能跳出英雄創造歷史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藩籬。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評經濟浪漫主義》）作為我國十七世紀中葉的進步思想家王夫之，繼承和發展了歷史上法家的進步歷史觀，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儒家反動的历史觀。對於他在當時儒法兩條路線鬥爭中所起的這種進步